

韓國書執筆史

李光德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美術出版社

而目為黑頭陀斯則採
既瑩戒珠復歸橫海閒
峯餌松實而止觀窅窅
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
長栢寺暨門多病來者

韓國書藝史

孫祥偁題



李光德 ●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书艺史 / 李光德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410-3570-8

I. 韩... II. 李... III. 书法-美术史-韩国-文集
IV. J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0970号

韩国书艺史

Han Guo Shu Yi Shi

李光德 著

责任编辑: 侯 荣 杜 娟

责任校对: 培 贵

责任印制: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设计制作: 急转弯设计工作室 028/66853989

印 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

成品尺寸: 210mm × 285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11千

图 幅: 48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570-8

定 价: 60.00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28) 86634481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023)68664153

庫國書畫刊

程祥傷題





作者简介

李光德，男，1949年7月10日出生于成都市。现执教于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先后主讲了本科生的《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书法实践》《汉语修养与写作实践》《实用美术》《书法美学》和全校公选课《艺术欣赏》《书法艺术》《艺术与人才》共10门课程。同时主讲了研究生课程《造型艺术研究》《设计艺术研究》《书法艺术创作》《书法作品鉴赏》等。

1989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自1992年起担任书法副教授，现任艺术学科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年度课题《东亚书法史研究》负责人。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出版了《书学丛言》《中国古今女美术家传略》《中华书学大辞典》《东亚书法史纲要》《韩国书艺史》共5部个人专著，另有个人专著《韩国书艺精鉴》《汉字书法与对外传播》正在出版之中。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多篇。迄今有学术研究成果500多万字。

学术积淀丰厚，被业内专家誉为“东亚书法史学”的开创者；拥有私家藏书16000多册，2007年被“全国第十七届书市”和“全国首届图书博览会”授予“十佳藏书人”称号，是重庆市几十所高校中唯一获此殊荣者。

主研方向：汉字文化对外传播；东亚书法史研究；汉字书法与宗教文化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邮政编码：400045
通讯地址：重庆大学B区东村29-9-4号
住宅电话：023-65121121
电子信箱：lgd65121121@163.com

目 录

序 言

韩国的书艺（代序）——任昌淳（韩国） / 007

韩国书法的历史与现状——宋明信（韩国） / 025

第一章

古朝鲜时代 —— 汉字和汉文化的传人 / 038

第一节 汉字和汉文的传入及影响 / 038

第二节 乐浪文化的兴盛及意义 / 042

第二章

三国时代的书艺 / 054

第一节 高句丽的书艺 / 054

第二节 百济国的书艺 / 067

第三节 新罗国的书艺 / 075

第三章

统一新罗时代的书艺 / 084

第四章

高丽时代的书艺 / 119

第一节 高丽时代前期的书艺 / 123

第二节 高丽时代后期的书艺 / 140

第五章

李朝时代的书艺 / 170

- 第一节 李朝时代的书坛概况 / 173
- 第二节 李朝建国初期的书家 / 179
- 第三节 安平大君中心时期的书家 / 188
- 第四节 壬辰战争前的书家 / 209
- 第五节 壬辰战争后的书家 / 240
- 第六节 李朝后期的书家 / 258
- 第七节 李朝时代的碑碣、墨迹和法帖 / 273

第六章

近现代的书艺 / 293

附录

- 朝鲜篆刻史——邓昌成 / 316
- 韩国古代传世之图——李强 李光德 / 325

附图目录 / 331

本书撰写主要参考文献 / 377

跋言 / 378

韩国书艺史年表 李光德 / 381

韩国的书艺 (代序)

—— (韩国) 任昌淳

“书艺”是指“追求艺术价值的文字书写”，在中国称之为“书法”，在日本称之为“书道”，术语相异而意旨相近。在韩国的古代跟中国一样，将书写作为“六艺”之一，而现代韩国人，以艺术的概念称之为“书艺”。

韩国的书艺，其表现对象也是文字。韩国的文字有汉文和韩文之分，韩字是在公元15世纪中叶创制的。虽然历史不长，但一直作为审美对象流传至今。这里论述的是以汉字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书法艺术。

韩国使用汉字的记载可追溯至两千年以前，历史悠久、变化甚丰，其间书写的名家辈出。虽然今天要想查检韩国最早使用汉字的文献记录已不可能，但韩国历史的古朝鲜时代，正值中国的西周至西汉时期，当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是可以想见的。从一些历史遗物看，大约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汉字就传到了朝鲜半岛。

今人可以看到：出土于平壤的上有秦铭文的兵器以及西汉的铜器上的铭文。这些文字遗迹在出土于西汉乐浪郡的瓦当、封泥、玺印、墓砖中也有大量发现。汉字分为殷周时代的古文、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等，由于时代的变迁在日常使用中也有变异。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以隶书为主，同时还掺入了楷、行、草等书体，将实用的功能升华为可供鉴赏的艺术品位。

韩国书艺直接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模仿不同时期的中国书坛名家。以晋代的王羲之，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宋元的苏轼、赵孟頫和其后的董其昌等，对韩国书艺史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有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和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汉晋以来的大量书法遗迹出土，唐宋以来的纸本墨迹多有承传，这对研究当时的书艺特征及笔法特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但在韩国，高句丽时代的真迹仅有十余件，李朝时代“壬辰倭乱”以前的真迹也不太多，此乃战乱频繁所致。遗存的作品大多为书札和诗帖之类的小品，匾额、屏风、挂轴类作品存世不少。榜书类的墨迹也多有流传，大多因木刻而保存。由于韩国建筑的特点，屏风、挂轴类的作品适合在结构狭小的空间使用，这也是书法得

以留传的重要原因。

同一书家的作品因不同时期而其水平有所不同，若果仅凭书家的一两件小品来评判其整体风格，显然是不可取的。实用书写和书法创作是不同的，如日常生活中的书信和手札，未必都能当做重要的创作来看待，和艺术鉴赏相比，往往其文献价值则更为突出。现存韩国书艺史料中除了少数的名家之外，如果仅据一两件书信手札来评判一位书家的风格显然会以偏概全，这为编著韩国书艺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外，由于国家机构收藏的名家作品较少，而多为私人收藏，故书史研究者获得资料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在中国，法帖盛行，名人的墨迹也流布很广，其代表作当推宋代的《淳化阁帖》。其中包括汉章帝、张芝、崔子玉以及汉魏钟繇与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名家共八十余人，“王羲之书”三册、“王献之书”二册，总计十册。其后有北宋米芾的《宝晋斋帖》，明清以降亦多次翻刻。当然这其中也有真贋问题，加之刻工的巧拙不一，也会大打折扣。但法帖对碑刻的传播与流布则功不可没。然而在韩国，刊刻的法帖却不多，高丽时代几乎没有，现有流传的有以下几种：

《匪懈堂集古帖》	李 瑑
《海东名迹》	申公济
《观澜亭帖》	李 俔
《大东书法》	李志定
《古今历代法帖》	朴文会
《海东名家笔谱》	白斗鏞

在上述法帖中，笔者藏有《匪懈堂集古帖》一卷，其间摹刻有中国法帖数种，另有匪懈堂李瑑的跋文，但没有韩国人书法。朴讷的《白月栖云碑》摹刻中提到“曾见《匪懈堂集古帖》中的金生文字”，此册中却没有，抑或还有另外一部，不得而知。《海东名迹》中收集有金生、崔致远以及高丽、李朝初期的名家作品，这是现存名迹中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大东书法》收集了从新罗到李朝后期的名人书法。除此之外，还有由国家刊刻的《列圣御笔帖》。

真迹比较法帖来说留传较少，但韩国还有较多的金石资料。其中有陵碑、墓碑、塔碑、纪念碑、墓志等。高丽以前的有四百余件，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又为书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上述三种资料概括了韩国书法的源流。研究韩国书艺史则应作时代划分，为方便起见，以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代、李朝时代为断代。

一、三国时代

(一) 高句丽

高句丽是三国中接受中国文化最早的国家，中国汉代很早就在这里设置了四郡，即：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玄菟郡。高句丽在公元3世纪末才完全驱逐了外来势力，一直到最后将领土扩张到辽东一带。政治势力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朝鲜半岛的民族在书法、文学、绘画、建筑、刻艺诸方面都发扬着汉族的文明。

汉置四郡时期留下了不少遗物，被断定为汉章帝元和2年（公元77年）即高句丽太祖王25年的《粘蝉县神祠碑》，是汉隶遗风代表作，同时还有漆器上的书法和各种墓砖上的铭文都彰显出汉代书艺之精髓。这些皆为高句丽上流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后，颇有教养的产物。高句丽近700年的辉煌王朝被唐军瓦解后，其历史和王朝世系传承的文献现已残缺不全，大部分史料必须依赖中国文献才能找到。欲在朝鲜半岛寻得这一时期的墨迹文献资料几无可能，只能从现存的几件遗存中窥见高句丽书法之片貌。

《广开土王陵碑》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书法巨碑，迄今仍立在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字体为隶书，高达7m，四面环刻，其中最大的字径近30cm，其书刻年代为公元414年。当时的中国正普及楷书，很少使用隶书。在高句丽同期出土的还有楷书《牟头娄墓志》，是常见的楷书。王碑使用隶书则是为了体现出一种庄严和虔诚，该隶书没有波磔，和雄健古朴的西汉隶书相同，在高句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独特风格。有评者称：从《陵碑》书法中可以看出七八分篆隶之味道和二三分楷书之笔意。1989年在忠清北道中原郡发现了《高句丽中原碑》，书体为楷书，书法精神和《广开土王陵碑》有许多相通之处。

《牟头娄墓志》为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广开土王陵附近墓室内壁上的墨书。在壁上画有纵横界格，全81行，每行10字。文字多处模糊不清，可辨识的不到300字。墓的主人叫牟头娄，经考证，他是广开土王时代的重要使者，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物。此志书法有着较强的隶书意味，与中国北朝书风有着相似之处，点画飞动，笔

力劲健，横画斜勒中洋溢着隶书之意蕴，较强地体现出从隶向楷过渡之特征。中国同一时期的写经书法大都是此类风格。

另外还有平壤城墙的石刻，这些石刻记载了建造平壤城墙时工程负责人的官职、姓名以及所负责的范围等内容，现存三处。因为是在工程现场即席书刻的，显然不具有庙堂碑刻之典雅。该石刻为行楷书，点画遒劲，具有典型的北魏书法之特征，是高句丽人特有的雄劲气魄之书风。这方面，与王陵出土的隶书砖铭和庆州《广开土王壶杆铭》的隶楷中含篆意如出一辙，在高句丽为数不多的书法遗迹中，都以其鲜明特征体现出来。

（二）百济

百济初期，在京畿道和现在的首尔建造了王都，和高句丽数次战争之后，于公元475年首都沦陷。后在公州新建国都，再经过60余年到公元538年又向扶余迁都。公元668年百济被新罗和唐朝的联军所灭。

与高句丽全面接受中国北朝的文化一样，百济和中国的南朝交往非常密切。因为陆地为高句丽所阻塞，所以只有通过海路与南朝交流。可以看出当初百济的外交意图是为了攻击与中国北魏联合的高句丽，惟恐高句丽接受中华文化而强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百济便与中国的宋、齐、梁诸朝进行了亲密的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百济灭亡后，因为和高句丽一样没有文化遗存，所以今人很少见其历史文献和作为遗物传承的金石。所幸近年在公州发掘出武宁王陵时的《买地券》两件。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扶余发现了《砂宅智积堂塔碑》残石，这为数目不多的百济书迹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令人欣喜。1971年和《武宁王陵买地券》同时发掘出的还有置于墓室入口处的两块土砖墓志，此志上刻有“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字样。斯麻是百济武宁王的名字，经考证其生卒年代和《三国史记》上记载相一致。公元525年营造王陵时同时入葬的买地券，也是韩国所发现最早的买地券。买地券是中国流行的道教仪式之一，写明向土地神买土地作基地的契约。这种仪式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流行，在韩国高丽时代的志石中才有所发现。这两块《买地券》不光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书法史研究上也极为重要。其年代在《广开土王碑》百余载之后，比新罗《真兴王巡狩碑》要早40年。与高句丽碑追踪中国北朝书风相对应，《武宁王陵志》呈纯粹的南朝书风，优雅流丽的风尚，行云流水般的运笔，是不可多得的名

品。它和同时代中国的金石遗物相比也堪称优秀，是反映当时百济文化具有高水准的重要资料。

《砂宅智积堂塔碑》经考证为百济末期的作品，是为纪念奈祇城一个名叫智积的人捐建佛堂佛塔的碑刻之一。字迹较大，字体方正峭劲，呈现强烈的中国书风。文体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美辞丽句的骈文。此时百济已把中国南北朝的文化同时引进、消化和吸收。作为百济的遗物，除以上几件之外，还有佛像铭和瓦砖铭等，斯为略之。

（三）新罗

新罗是三国时代接受中国文化最晚的国家。可以看出，当时汉文化和佛教是同时输入的，据史书记载：新罗承认和接受佛法是在法兴王（公元514年~539年在位）时代。法兴王以前也曾通过高句丽输入了汉文和佛教。由于和中国的正常往来，新罗大约在公元6世纪初的法兴王时代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当属无疑。最近，在庆尚南道蔚州郡川前里新罗金石遗物中，发现了最早的文字遗迹。广阔的岩面上刻有史前时期的岩画，岩画下部有《摩崖题记》，其书法是稚拙的新罗字体，不同于成熟的汉文字体。经考证这是法兴王（公元514年~539年在位）时期的遗迹，也是新罗最早的书法遗迹，此后到三国统一前则有着比较多的金石遗迹。新罗真兴王时代（公元540年~575年）占领了汉江流域并深入到东北的高句丽领域，到了新罗的中兴时期，有王朝纪念碑《昌宁拓境碑》（公元561年）、北汉山三处最早的《巡狩碑》（公元568年）和记述真平王（公元579年~631年在位）时期建造南山新城的《南山新城碑》（同时发现的刻石有四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书法遗迹。

最近在忠清北道丹阳郡还发现了《赤城碑》。这个地方除发现巡狩碑之外，还发现有文字、文章、刻工均不成熟的刻石，但这些石刻在书法上却显示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特色，不拘一格，自由率真，结构天成，应是这一时期民间书风的特点。

《巡狩碑》是纪念真兴王巡幸新扩张之领地所兴建，汉城的北汉山、咸兴的黄草岭、利原的摩云岭都是斯碑所立地。内容大同小异，《摩云岭碑》保存较完好，《黄草岭碑》点画有所损坏，《北汉山碑》原型完整，但文字磨损，难以卒读。

《黄草岭碑》的碑文为骈体，显示出端严庄重的王者辞令之品位，书法洋溢着北朝纯真优雅之品格，在接受汉文化时间较短的新罗书法中诚为惊人之杰作。该碑撰

文者及书写者均不详，只记下了巡幸随行官员之名，隐隐可见沙门法藏慧忍之笔致。此人为僧侣，文笔气魄宏伟，但经考证绝非出自慧忍之手。

以上为韩国史上“三国时代”书法之概观，有高句丽时期之隶书，亦有接受汉文化较晚的新罗碑刻。在书法特征方面，不仅有高句丽笔势的雄强开张、百济结体的优雅典洁，还有新罗书风的朴茂高古。这些不以模仿为目的之书艺特点，在雕刻、工艺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书法艺术能够反映东亚各国的国民性以及民族文化的风格，鉴赏书法艺术实在是殊有意义的。

二、统一新罗时代

当北方的高句丽为维系国家命运而集中全力对付隋唐时，新罗则积蓄国力和中国展开了频繁的外交，引入唐军攻占高句丽和百济，于公元660年和668年相继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新罗王国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在三国时代末期与唐朝的交往中，其政治外交的意义比文化方面的意义重要得多，文化输入则是其次。新罗在统一成功的同时，从学术文化到政治制度都模仿中国，进入了全盛期。由于使节的往来愈加频繁，官僚子弟和僧侣赴唐留学而长期不归者逐渐增多。加上唐朝国子监专为外国留学生设置有科举的“宾贡科”，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及第后回国做官的人也不少。元圣王代（公元785年—798年在位）选用武术人才的制度废止后，设立了“读书出身科”制度，最早制定了以中国“明经科”为标准的考试录用制度，汉学因之大为勃兴，精通文章翰墨者人材辈出，书法也因此勃蓬发展，从留传至今的史料可以窥视当时艺坛繁荣之一斑。

唐朝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亦为确立文学基本规范之时代。由于中国南北朝是隶书向楷书过渡发展的阶段，书风具有浓郁的古朴意味。在艺术风格形成前的准备时期，书法的点画和结构尚未达到高度的洗炼，处在一种淳朴自然的阶段。到了初唐，名家们则确立了楷书法则，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大家表现出一种完备且具个性的书法品格，他们的书风也逐渐影响到朝鲜半岛的新罗。

新罗的书迹，近年发现有公元755年的手写《华严经》和传至日本正仓书院的《新罗帐籍》，同时也留传了大量的金石文字。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的王羲之

书体在统一新罗初期占据了主流，以后模仿唐欧阳询书体才逐渐多起来。《沙林寺弘觉禅师断碑》和《鳌藏寺断碑》都是集刻王羲之字，后者可与中国集王字代表作《圣教序》相媲美。在新罗，由于王羲之的遗迹大量传承，故对王的书法尊崇备至。新罗保存的行书碑刻都是以王羲之书风为法则，代表作有僧灵业书写的《神行禅师碑》，这件作品曾被后人误为是集王羲之书。其他如甘山寺的《弥勒阿弥陀如来造像记》和《圣德大王神钟铭》等，易颇呈王书风格的名作。石经类有全罗南道求礼郡华严寺的《华严石经》和发现于庆州昌林寺的《法华经残石》。华严寺在文武王时期建立之后，定康王元年（公元886年）为祈求其父宪康王的冥福在觉皇殿内石壁上嵌入石刻《华严经》，即《华严石经》。由于战乱，建筑物遭焚，散佚的数百片石经残石后来才部分搜存。从残石中可以看出，石面上画有界格，字径15mm左右，行28字。从书风上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其风格属于摹习欧阳询体和唐人写经体，与唐朝的《开成石经》年代大致相仿。《华严石经》当为石经书法的上乘之作。《法华石经》的刻立年代虽难以确定，但足以与《华严石经》相媲美而被并称为新罗石经之双璧。另外还有在全罗北道益山王宫里五重石塔中发现的《金板金刚经》，在金板上刻写经文，其样式奇特，书艺亦为精美之作。

书法大放异彩的还有《柏栗寺六面石幢》。新罗法兴王（公元514年~539年在位）时期，朝廷允许传播佛法，但土著宗教势力对外来宗教的传入强烈反对。当时，国王的近臣异次顿为了宣扬佛法，甘愿为佛法舍弃性命，相传在他死时出现了奇迹，其首级落地时喷射出乳白色的血，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该石幢就是为供奉殉教者异次顿而建的，第一面镌刻着异次顿殉教场面的浮雕，第二面到第六面记录着殉教的事迹，原石陈列于国立庆州博物馆。这个石幢铭文一部分遭磨损，难以判读。该铭文的字体隶楷兼备，尤为殊异。和前面言及的高句丽《中原碑》书法相类，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书风亦类似。到了唐代，这种书体逐渐消失，该石幢铭在书法史上不多见。统一新罗时代的碑石形制多类中国唐朝的神道碑，通常高达2~3m，有螭首、龟趺、篆额。碑石种类有王陵碑、僧侣塔碑、寺刹事迹碑以及工程纪念碑等。作为王陵碑有《太宗武烈王碑》《文武王碑》《兴德王碑》。《武烈王碑》现仅螭首和龟趺遗存，螭首中央有篆书碑额“太宗武烈大王之碑”，其碑身不知去向。《文武王碑》残石所遗文字是呈欧体风格的书法名迹。二十余年前还出土了《兴德王碑》部分篆额残石。

僧侶塔碑有寶林寺《普照國師碑》、高仙寺《誓幢和尚碑》殘石、雙谿寺《真鑑禪師碑》、聖住寺《朗慧和尚碑》等代表作。《普照國師碑》由金蘧和金彥卿用兩種字體書寫。金蘧用楷書，金彥卿用行書，相映成趣，異彩競呈，皆為呈王羲之書風而又具功力的書作。二人的手跡在慶州博物館《宣王神鐘銘》的銘文上留存，序文為金某楷書，銘文為洪端行書。《誓幢和尚碑》即著名高僧元曉大師之碑，過去曾見到過殘石，近年又發現了其他部分。整體看來，其碑身規模不大，文字也很少，書體為行書，頗似集刻歐氏《仲尼夢奠帖》《卜商帖》的字體而成，有學者疑為出自別的高手，即使在中國也是難覓之金石逸品。《真鑑禪師碑》和《朗慧和尚碑》的銘文皆為崔致遠撰，前者為崔致遠書，後者為崔彥勃書。崔致遠曾在唐留學，科舉及第後官拜侍御史內供奉，為文壇大家，其詩文在大唐亦聲名顯赫。回國後，國王命其撰寫《崇福寺碑》和風嚴寺《智証大師碑》碑文。崔致遠的文章以精妙著稱，觀其《真鑑禪師碑》，決不遜於唐代大師之文筆。其書風酷似歐陽詢之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崔彥才為也是新羅末期入唐留學并科舉及第之人物，文名甚高，至高麗王朝時改名仁澆。彥勃曾書有大量碑銘，但今僅存《朗慧和尚碑》，其書法方面與新羅時代其他名作相比略遜一籌。

在此需特別言及者乃金生，他是韓國歷史上——特別是新羅時期最負盛名的大書家。聖德王10年（公元711年）出生，於8世紀末元聖王（公元785年~798年在位）時期去世。《三國史記》稱：他畢生與毛筆相伴始終，隸、行、草諸體皆臻出神入化之境界。但傳為其真迹者《朗空大師碑》，實為高麗時期名僧端目所集刻，這和唐釋懷仁集王書《三藏聖教序碑》頗相類，此碑應是金生的代表作。金生曾崇學當時流行的歐體，而其造型又因襲了王羲之以及六朝人之遺風，並對褚遂良風格亦用功尤深，這些特點在其書作中都顯而易見。他在書法中，通過細小的點畫變化，將線條的韻律激活起來。金生書法結構平穩，字體變化有陰陽向背之妙，其效果頗為自然。在李朝集刻的《大東法帖》中有金生大字作品《廬山瀑布詩》，另有其單行帖本《田游岩山家序》行世。這兩件作品可以典型地體現出金生的藝術個性，前者氣勢恢宏，後者則打破常規結構，其特征比起端莊的結字更能體現功力和神韻，韓國歷史上效仿中國書家而又有自己的格調和才情的神品，由此可見一斑。中國李白被稱作“詩仙”，新羅金生則可稱為“書仙”。高麗時期李奎報《東國諸賢書訣評》稱金生書法為“神品”，實不為過。如果說中國書法史上唐代是燦爛的時期，韓國書史上統一新

罗时代则为全盛期。

统一新罗时期的金石除以上言及者以外，还有很多名作，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高丽时代

高丽时代初期设立了科举制度。新罗的“读书出身科”是通过背诵经典来选拔人才，而高丽则设有由中国科举制度传入的“制述”和“明经”两个科目。“明经”和“读书出身科”相同；“制述”则一定要通过对诗、赋及其他文学形式的考试，考试录选不仅依据诗和赋的优劣而判定，书法水平亦作为检验其修养的重要标准。要想成为文班官僚必须接受这两个科目的考试，称为“本科”。其他“杂科”也要进行考试，杂科比文班官僚资格低，是录用各类专职人员所采用的考试科目。在杂科中也有书法专业，书法专业是朝廷设置的以书写为主的吏员职业，其所要测验的科目有解释《说文》和抄写《五经》，书写技艺必须是过硬的真书、行书、篆书等诸种书体。培养提高书法专门人才的地方为“成均馆”，其中设有书学博士。各官府设有书令史、书艺、试书艺、书手等不同级别的胥吏，专门从事书写事宜。这些制度的完备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兴隆和普及。

在高丽的书法墨迹遗存中，有数件古文书和高丽末期的几十件写经作品，另外还有尚未鉴定出真伪的一些所谓的名人手迹。与新罗时代相似，绝大部分书法史料皆为碑碣和墓志等，最早的《大藏经》以及各种雕版书籍的文字，亦为重要的书法研考史料。

碑碣方面同样有寺迹碑和高僧塔碑，文字内容和书法都是奉王命而虔诚完成的，这些都是高丽时代文化的精粹。

高丽时代初期沿承了新罗时代师法初唐诸大家的传统，主要受欧阳询书风之影响。欧书的点画结构方正谨严，每写一画皆需聚精会神，不能丝毫懈怠，故法度极其严谨。大凡建碑，世人皆持郑重虔诚之心境，而欧法最能体现这一心境。当时，师承欧法的有具足达、韩允、闵赏济、安民厚、林颢、吴彦俊等出类拔萃之名家，同时在师承唐宋其他各家方面也涌现了许多卓越的书坛高手，特别是李元符和张端说还兼擅虞世南的笔法。李元符《元景王师碑》用的是虞法，安养《七长寺碑》则是以欧法为楷则，张端说《静真大师碑》采用虞法，高达院《元宗大师碑》则采用

的是欧法。当时有不擅长虞法才用欧法，故而尊奉欧法之说。尤为奇特的是高丽太祖王建23年（公元940年）所建《真空大师碑》，是高丽太祖所撰碑文并集刻唐太宗李世民的字而成者。唐太宗精通书法且尤嗜搜集王羲之真迹，欧阳询等初唐名家在其宠爱下名声大振。新罗太宗武烈王曾派使节入唐求御书，唐太宗将御笔亲书的《温泉铭》和《晋祠铭》赐予武烈王。尔后这些拓本从新罗宫廷传至高丽王朝，于是后人才有集刻唐太宗书法之条件。唐太宗的行书气魄雄浑，大有王者风范。高丽太祖在建国之初以自撰的文章集刻唐太宗字，于此可见其雄才大略。除此之外，还有金莲《龙头寺铁幢记》集柳公权字、《僧伽窟碑》集颜真卿字，蔡忠顺《玄化寺碑阴记》用欧氏行体书写，又与欧体殊存异趣。《僧伽窟碑》今已不存，《金石清玩》中收有其部分拓片。以上介绍的是高丽初期的书家。到高丽中期，书坛为之大变，这期间出现了书艺旷世奇才僧坦然。

僧坦然（公元1070年~1159年），俗姓孙，精通儒家经典，19岁遁入佛门，因曾担任高丽睿宗之先生而被封为国师，死后谥为“大鉴”。坦然是位德学双馨之高僧，在佛门中享有书法盛誉。其书法打破了一味尊奉欧书之世风，而主要追随王羲之。传其所书的春川郡清平山《文殊院碑》早已遭毁，原石不存，所幸全拓本得以流传后世，由此可窥其书法真貌。此作受王羲之集字《圣教序》之影响显而易见，但又非王书之翻版，而是吸取其劲直之意味，在流丽之韵致中参入了扛鼎之力。李奎报《东国诸贤书诀》称其书为“神品”，李仁老在《破闲集》中有“引铁为筋，摧山作骨，力可伏辔，利堪穿札”之赞语。与坦然同时期的雕版书籍《大觉国师文集》之字是大觉国师义天的弟子慧观所书，也是高丽雕版书籍中的书法逸品。高丽版《大藏经》中有个人文集和历史文献若干卷，其后期的海印寺本则全为欧阳询字体，只有《大觉国师文集》的字和坦然的书风有许多共同点，余者则可看出苏轼风格之影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高丽书法史上的大变革阶段。坦然之后继者为其门人僧机俊，僧机俊所书断俗寺《大鉴国师碑》和坦然书风几无二致，堪称忠实地继承了其衣钵。另外，庆尚北道清道郡《元应国师碑》的书写者虽然佚名，但明显呈坦然书风，仍不失为一幅杰作。

以上所言为高丽中期的书家。公元12世纪武臣政变掌握了政权后，排斥文人，使文学艺术大遭摧残，甚至全面衰退，书法艺术也在劫难逃。高宗末期的崔氏政权向元朝臣服后，书艺才有所复苏，其间优秀的书家有柳公权、金孝印等。柳公权